

义利之间：“新闻游侠”互联网平台生存的情感劳动研究

李佳影

(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陕西 咸阳 712082)

摘要: 在数字新闻业平台化转型的背景下, 一群前传统媒体人转型自媒体, 以“新闻游侠”的身份活跃于互联网平台, 通过情感劳动维系生存并参与新闻实践。本研究基于“新闻游侠”这一本土化概念, 述评其概念建构的学术价值、“居间言说”机制的独特运作方式, 以及其特殊的情感劳动机制。研究发现, “新闻游侠”的情感劳动呈现出“义”与“利”的双重面向: 在“义”的维度, 他们通过对公共议题的共情投入延续新闻理想; 在“利”的维度, 算法逻辑迫使其将情感表达转化为可被平台量化的情绪展演; 而在二者的张力之间, 他们依托信任社群展开“去商品化”的调适尝试, 试图在商业逻辑与公共价值之间寻求平衡。

关键词: 新闻游侠; 情感劳动; 平台经济; 数字新闻业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3106-177X (2026) 08-0016-04

DOI: 10.62022/AG.issn3106-177X.2026.08.006

Between Righteousness and Profit: A Study of the Emotional Labor of "News Rangers" Surviving on Internet Platforms

Li Jiay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Xizang Minzu University,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platformization of digital journalism, a group of former traditional media professionals have transitioned into self-media practitioners, actively operating on internet platforms as "news rangers" and sustaining their survival and journalistic engagement through emotional labor. Grounded in this localized concep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cademic value of its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the distinctive operation of its "intermediary discourse" mechanism, and its unique emotional labor mechanism.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motional labor of "news rangers" exhibits a dual orientation of "righteousness" (yi) and "profit" (li): on the dimension of righteousness, they sustain their journalistic ideals through empathetic engagement with public issues; on the dimension of profit, algorithmic logic compels them to transform emotional expressions into emotional performances quantifiable by platforms. Caught in the tension between these two dimensions, they rely on trust-based communities to undertake "de-commodification" adjustments, attempting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commercial logic and public value.

Keywords: news rangers; emotional labor; platform economy; digital journalism

“新闻游侠”作为一个学术概念, 经历了从日常话语到学术概念的转化过程, 其内涵也存在不同的理解路径。从词源上看, “新闻游侠”的概念最早由媒体从业者张丰提出, 用以描述融媒体时代一类特殊的版权侵权现象^[1]。

张晨与万旭琪的研究, 对“新闻游侠”进行了更具理论深度的重新概念化, 他们将“新闻游侠”界定为“拥有传统媒体从业经历、离职后仍以独立身份活跃于数字新闻场域的内容创作者”。这一界定剥离了“新闻游侠”概念中的侵权指控色彩, 转而关注这一群体在数字新闻场域中的角色建构与实践逻辑。在他们看来, “新闻游侠”是一类介于职业社群和新行动者之间的“居间”行动者: 一方面通过“爆料”式随机新闻行动同职业社群竞争受众注意力; 另一方面又开展行业经验评议、媒介素养启蒙等话语行动, 试图修复职业

社群的社会评价危机^[2]。

本文采用后一种更具辩证性的理解, 这一界定的优势在于: 它避免了将“新闻游侠”简单化为侵权者或破坏者, 而是辩证地把握了该群体在数字新闻生态中的复杂角色——他们既非新闻权威单向度的破坏者, 也非传统新闻价值的纯粹守护者, 而是呈现出破坏和塑造的双向可能性^[2]。

在传统媒体系统性收缩的背景下, 大量具有新闻专业素养的记者、编辑离开体制, 涌入微信公众号、抖音、B站等互联网平台。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已有超过300家广电机构布局MCN业务, 省级以上广电MCN超28家, 超过5万名主持人在新媒体平台开设账号^[3]。在平台化新闻生产中, 情感已成为联结博主、用户与平台的核心介质^[4]。“新闻游侠”需要调动共情能力以唤起受众关注, 同时又必须将情感表达转

作者简介: 李佳影,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新闻学。

化为可被算法识别的流量指标。

本研究植根于三重宏观语境。一，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观念从“文体中心”转向“产品中心”，新闻从一种传递信息且符合专业规范的特定叙事文本，逐渐汇入平台化和规模化的大众信息商品产销体系^[5]。二，数字新闻生态使情感话语成为公共话语空间的突出类型，情感劳动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从业者无法回避的生存技能。三，传统媒体人的大规模出走。全球新闻业危机下，大量传统媒体人离开体制，在数字平台上寻求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一、情感劳动的理论根基及其在数字时代的拓展

（一）两条理论路径

理解“新闻游侠”的情感劳动，首先需要回到情感劳动理论本身。

第一条路径由美国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开辟，她将情感劳动界定为“为获得报酬而出售”的情感管理劳动，劳动者需要通过“表层表演”（surface acting），即仅改变外在情绪表达，或“深层表演”（deep acting），即真正改变内在感受，来符合组织制定的“感受规则”（feeling rules）^[6]。这一理论揭示了情感的社会建构性及其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的商品化机制，但是此分析框架对于理解数字平台时代的情感劳动有所局限。

第二条进路来自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哈特与奈格里。他们提出了“affective labor”概念，将其视为非物质劳动的核心构成之一^[7]。他们认为，情感劳动不仅生产情感体验，更生产社会关系乃至社会生活本身，是一种“生命政治生产”。这一理论将情感劳动从服务业拓展到整个后工业经济领域，但其对情感劳动的界定过于宽泛。

学者田林楠指出这两者存在显著差异——“情动劳动”可被理解为劳动者在自主性情感动下进行的创造性的、非规训性的情感实践，而霍克希尔德意义上的“情感劳动”则侧重于受感受规则约束的、策略性的情感管理^[8]。这一区分对于理解“新闻游侠”的实践尤为关键——他们的情感投入既包含受商业逻辑规训的策略性表演，也包含源自新闻理想的自主性情动驱动，两种力量在“义利之间”持续拉扯。

（二）数字平台中的情感劳动：控制、异化与主体性

近年来，学者们对短视频平台、社交媒体上的情感劳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揭示了几个重要特征：

一，平台对情感劳动的控制更加隐蔽。刘战伟等学者发现，平台并非通过传统的强制性管理手段，而是通过一套精

密的机制来实施劳动控制。具体而言，平台通过一系列巧妙的方式来“制造”劳动者的“同意”——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不稳定、没保障的工作状态。比如，平台会强调“玩抖音也能赚钱”“做自己喜欢的事还能有收入”，让创作者把劳动误当成“玩乐”；会用“去中心化算法”来营造“公平竞争”的幻象；会用“曝光机会”来替代当下的经济报酬^[9]。

二，情感劳动带来了新的异化形式。陶贤都与石鑫的研究聚焦于主流媒体短视频新闻创作者这一特殊群体，他们发现，在算法的支配下，新闻创作者的情感劳动出现了“四重异化”：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作品的价值不由自己说了算，而是由流量决定；二是劳动过程的异化——创作不再源于兴趣和使命，而是为了完成数据指标；三是类本质的异化——创作者从有思想的新闻人变成了追逐流量的“工具”；四是人际关系的异化——创作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被商业逻辑支配的情感交易^[10]。

三，情感劳动也存在主体性的一面。刘冬璐和潘可武的研究从“情动理论”视角考察了短视频博主的情感网络。他们发现，博主通过真诚的情感投入与用户建立连接，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差序化”情感圈层——核心粉丝、普通粉丝和路人观众。在这个过程中，博主并非完全被动的“情感劳工”，他们也在主动经营人设、选择内容方向、构建社交关系^[4]。学者刘雨婷则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指出，情感劳动的根本困境在于私人情感被资本的运作逻辑商品化了，走出困境需要让情感劳动回归满足人的真实需求而非资本增殖的工具^[11]。

二、“新闻游侠”的情感劳动：核心议题与研究发现

（一）从“闯入者”到“新闻游侠”：本土概念的理论建构

在“新闻游侠”这一本土概念提出之前，学界对职业社群之外新闻行动者的指称经历了多次演变^[2]。英文学界使用的概念包括“闯入者”（interlopers）、“外围行动者”（peripheral actors）和“新闻业中间人”（in-betweeners of journalism）^[2]。这些概念虽各有侧重，但都有一个隐含预设：职业社群占据新闻场域的“中心”位置，其他行动者则处于“外围”地位。

张晨与万旭琪的“新闻游侠”概念，试图超越上述概念的局限，从三个维度阐发了前传统媒体人的独特性：在身份属性上，“游侠”的特点是“游”——不受固定身份的束缚，在不同角色间切换。“新闻游侠”同样如此，他们既是曾经的新闻专业人员，又是当下的自媒体运营者，有时还是企业

公关、内容创业者、网络红人等多重角色的叠加。这种身份上的“游”使他们既不同于体制内的记者，也不同于纯粹的流量博主。在行动纲领上，“游侠”的传统是“义”字当先，但“游侠”的行为常常“不轨于正义”——既有侠义精神，又可能越出常规。“新闻游侠”也面临类似的张力：一方面，他们以新闻理想和社会责任自我期许；另一方面，为了在平台生存，他们必须适应流量逻辑和商业规则。这种“义利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他们行动的核心特征^[2]。在位置关系上，“新闻游侠”游离于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之间，他们既与职业社群争夺流量，但又以提供新闻线索、参与行业讨论的方式与后者保持合作。

（二）“居间言说”：情感劳动与新闻权威

“新闻游侠”的核心实践方式是“言说”——就是在各种平台上发表评论、反思、批评来参与新闻业的讨论。张晨和万旭琪将这种言说概括为“对内修补”和“对外宣导”两种机制。

“对内修补”面向的是职业社群内部^[2]。前媒体人通过批评和反思两种话语，参与对新闻范式的“修补”^[2]。所谓“修补”，指的是当新闻业出现失范现象时，行业需要通过重申规范、边缘化越轨者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研究将这种修补分为两个层次，例如早期他们可能批评某家媒体报道失实，后来则开始讨论“新闻与流量的关系”“新闻专业的脆弱性”等深层问题。“对外宣导”面向的是普通受众。前媒体人通过解释、保护和纪念三种话语，试图引导公众理解新闻业。解释话语用于澄清外界对新闻生产的误解——比如解释为什么灾难报道中会有细节描写；保护话语强调新闻业的社会价值，反驳“新闻无用论”；纪念话语则通过回顾新闻业的“黄金时代”，唤起公众对新闻专业价值的认同。

“居间言说”机制它拓展了“新闻权威”概念的内涵，传统的新闻权威研究将权威等同于职业社群的制度性管辖权——即只有专业记者才有资格定义“什么是新闻”。但“新闻游侠”的实践表明，新闻权威也可以附着于“新闻产品”本身而非特定的职业群体——只要内容符合专业标准、具有公共价值，谁生产的并不重要^[2]。

（三）“义利之间”：专业理念、市场逻辑与“侠义”文化的观念张力

“新闻游侠”的情感劳动最突出的特点，是始终处于“义”与“利”之间的拉扯之中。

张晨和万旭琪的研究发现，前传统媒体人的言说背后存在三个层次观念结构，而这个结构本身又充满内在矛盾。首先，最外层是政策性新闻观念，也就是关于“新闻应该怎

么做”的具体规范——比如报道要客观、要真实、要专业。这些是传统新闻业长期积累下来的基本要求，前传统媒体人即便离开了原来的单位，但仍然把这些标准当作评判新闻好坏的重要依据。其次是程式性新闻观念，就是指新闻专业价值本身。在中国媒体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这套专业理念逐渐成为从业者共同认可的行为准则，转型后的前媒体人也很难完全摆脱它的影响。最后是哲理性新闻观念，这个可以概括为“文人侠义”式的伦理自觉——把新闻工作看作一种社会担当，而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不过，理想归理想，现实是另一回事。前传统媒体人转型后运营自媒体，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流量竞争和商业变现的压力，市场逻辑因此深深嵌入了他们的日常实践。

平台在成为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把本应由公共部门承担的公共责任逐渐私有化了，并通过三种方式侵蚀了新闻的公共性：一是新闻叙事从客观呈现变成情感动员；二是算法和平台审核取代了传统编辑的角色，但审核标准不透明，本质上服务于商业利益；三是记者从公共文化的塑造者降为普通的内容提供者，新闻本身也变成了流量商品^[12]。换句话说，“新闻游侠”选择情感化的生存策略更多是平台逻辑下的被动适应——在流量至上的评价体系里，不这样做就很难被看到、很难活下去。

（四）比较视野下的“新闻游侠”研究

有学者对澳大利亚微信公众账号“小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对照案例。这些“小编”大多是中国女性留学生，负责从澳大利亚主流英文本土媒体翻译新闻并加以编辑，发布在面向华人社群的微信公号上。她们的劳动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需要通过“接地气”的翻译和评论与读者建立情感连接。研究揭示，她们面临着双重边缘化：一方面，作为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主流就业市场受到排斥；另一方面，在华人族群经济中又受到父权制结构的压制，报酬低、保障差、工作不稳定^[13]。

B é lair-Gagnon等学者则对美国新闻创作者的研究提出了“coping as competency”的分析框架。他们将新闻创作者在平台上的应对策略归纳为四种类型：制度性应对、边界性应对、情感性应对和策略性应对，揭示了在机构支持缺失的条件下，新闻创作者如何将生存策略内化为一种专业能力^[14]。实际上这与“新闻游侠”的“居间言说”机制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平台化时代，“应对”不再是个人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职业生存的核心技能。

此外，尹琪等学者发现，在双重职业规范——即正面宣传导向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张力下，中国记者面对职业创伤时

倾向于“向内归因”，就是把制度性困境归因于个人道德，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15]。由此，“新闻游侠”的情感劳动不仅是市场压力下的策略性表演，更可能承载着制度性创伤的心理代价，当他们不断批评、反思新闻业时，这些言说本身可能就是处理自身创伤的一种方式。

三、现有研究的理论贡献

第一，“新闻游侠”概念的本土化建构为理解中国数字新闻生态提供了新视角。这一概念的优势在于其辩证性：既承认“侠”的正面价值，又强调“游”的负面可能。与英文学界的“闯入者”“外围行动者”等概念相比，“新闻游侠”更准确地捕捉了这一群体的居间性——他们不是“闯入”新闻领域的“外行”，而是带着专业技能和价值认同“游走”于体制内外的“内行外移者”。

第二，进行了情感劳动与新闻权威的理论连接。此前的情感劳动研究多聚焦于一般性的服务业或平台劳动，较少与新闻学核心概念建立关联。张晨等学者的研究揭示了“新闻游侠”如何通过情感化的言说实践参与新闻权威的塑造，从而将情感劳动分析引入了新闻学的主流议题。这一连接的重要理论意义在于：它表明情感劳动不仅是劳动过程研究的一个细分领域，也关系到新闻业作为一个其他领域的理论建构。

第三，数字劳动批判的深化。刘战伟、马超、陶贤都等学者的研究将马克思主义劳动批判延伸到数字平台的情感劳动领域，揭示了平台资本主义条件下情感剥削的新机制。对“新闻游侠”的研究可以视为这一批判传统的具体化——它不是泛泛地讨论“数字劳工”，而是聚焦于一个具有特定职业背景 and 价值的群体，分析他们在平台经济中的特殊处境。

四、结束语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看到，“新闻游侠”的情感劳动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学者们已经建立了从情感劳动理论到平台劳动批判的分析框架，已经识别出了“新闻游侠”在身份、行动纲领、位置关系上的特殊性，并揭示了他们在“义利之间”挣扎、在互联网平台的生存机制。但与此同时，这个领域还存在许多值得深入的问题，比如“新闻游侠”的新闻定义权与平台的流量逻辑之间如何协

调？这一概念如何在国际比较研究中使用？这些问题的回答，既需要范围更广阔、更丰富的经验材料，也需要更精细的理论思考。

参考文献：

- [1] 刘海明, 臧博. 融媒体时代版权保护的挑战与应对 [J]. 中国报业, 2019, (19): 16-18.
- [2] 张晨, 万旭琪. 新闻“游侠”: 前传统媒体人的新闻守望与居间言说 [J]. 传媒观察, 2025, (11): 85-96.
- [3] 徐永青. 从“老记者”到“超级个体”: 我的媒体融合升维实践与思考 [J]. 城市党报研究, 2026, (5): 45-47.
- [4] 刘冬璐, 潘可武. 在情动与商业理性之间: 短视频博主情感网络的结构与形塑逻辑 [J]. 新闻与写作, 2025, (12): 94-105.
- [5] 常江, 杨惠涵. 数字新闻的产品化: 媒介逻辑与价值反思 [J]. 青年记者, 2023, (3): 21-24.
- [6] Hochschild A R.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J]. 2012.
- [7] Mäkinen K.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Emotional and affective labour in mom blogging [J]. New Media & Society, 2020, 23 (10): 2964-2978.
- [8] 田林楠. 情感劳动的“两副面孔”——从霍克希尔德到哈特与奈格里 [J]. 社会学评论, 2022, 10 (2): 88-103.
- [9] 刘战伟, 李媛媛, 刘蒙之. 平台化、数字灵工与短视频创意劳动者: 一项劳动控制研究 [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21, 28 (7): 42-58+127.
- [10] 陶贤都, 石鑫. 主流媒体短视频新闻创作者的情感劳动异化与价值回归研究 [J]. 教育传媒研究, 2026, (2): 110-116.
- [11] 刘雨婷. “被整饰的情感”: 数字时代情感劳动的主体性困境与复归 [J]. 南方论刊, 2024, (12): 3-6.
- [12] 常江, 狄丰琳. 数字新闻业的平台化: 演进逻辑与价值反思 [J]. 编辑之友, 2022, (10): 22-30.
- [13] Yang F. Affective News, Affective Labor: Chinese Female “Little Editors” of WeChat Official Accounts in Australia [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3, 9 (3).
- [14] Bélair-Gagnon V, Salamon E, Crawford M. Coping as a competency: A typology of journalists and news creators work on platforms [J]. Journalism, 2026.
- [15] Yin Q, Lyu X, Zheng S Y. I could have done more: Vicarious trauma expression and self-attribution among journalists' social issues reporting [J]. Journalism, 2026.